

专题文明史译丛

Themes in World History

世界历史上的革命

[美] 迈克尔·D. 理查兹 (Michael D. Richards) 著

任灵兰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专题文明史译丛

Themes in World History

丛书主编：苏智良 陈 恒

世界历史上的革命

〔美〕迈克尔·D. 理查兹 (Michael D. Richards) 著

任灵兰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历史上的革命 / (美) 理查兹著; 任灵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专题文明史译丛)

ISBN 978-7-100-11038-9

I. ①世… II. ①理… ②任… III. ①革命史—
研究—世界 IV. ①K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407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专题文明史译丛)

世界历史上的革命

(美) 迈克尔·D. 理查兹 (Michael D. Richards) 著

任灵兰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038-9

2015年7月第1版 开本640×960 1/16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张9

定价: 24.00元

上海市内涵建设文科师范一流学科项目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规划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译丛序言

人类文明史既有宏大叙事,也充满了生动细节;既见证着民族国家的兴盛与衰败,也反映了英雄个人的梦想和血泪。事实上,真正决定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那些恒常存在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文化心理等,它波澜不惊却暗流涌动,彼此关联而又催生变化,并裹挟一切外部因素,使之转变成自身发展和变化的动力。因此,那些关乎全球文明发展和彼此共生性因素,无一不成为研究的对象,无一不成为大众阅读的焦点。生态、交往、和平、安全、人口、疾病、食品、能源、犯罪等问题,凡此种种,既是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文明发展需要直面的,又是它们之间彼此交流、进行合作乃至相互促进的基础。在这种文明史的叙述中,阶段性的政治内容相对淡化,长时段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文化和社会生活得以凸显。文明史的目的是介绍、传播人类文明、文化知识与价值观念,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通过文明史的阅读明了人类尊严获得的历史,从而塑造自己的生活理念。

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与世界各国往来日益密切,这一方面需要我们阅读文明史以更真实、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域外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文明史也可以培育人们更加开阔的思维、更加完善的人格。多读文明史,不仅能让人们认识到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使人们能以兼容并包的思维看待世界和人生,而且可以从历史发展的多变中汲取有益的智慧,训练理性思考的能力。

在文化多元交融的全球化时代,了解、掌握人类文明知识和理念

是当代国人应该补上的一课。因此,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象牙塔,虽然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知识形态转变为普通民众也能接受的大众文化。况且,普及大众文化,才能不断出现更多的人才参与研究工作,文化也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不断出现更丰富的精英文化。这是一个相互依存,循环发展的过程,缺一不可。

主编过“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曾说,“小册子并不比大部头好写”,可见从写作角度来看,浅显易懂的著述并不比那些高头讲章好写。大众阅读是要用较少的时间又能快速获得相关知识,因此叙述不但简明,更要生动,要有历史细节,有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故事点,可见这样的书并不好处理。

第一,大众作品的通俗读物虽然结构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大事不能漏,小事不能错”,达到“悦”读的境界,并不容易。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宏观视野,没有承上启下的问题意识是难以做到合理选择题材,善于取舍材料,有的放矢的。

第二,真正受大众欢迎的作品必定是能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能在读者心目中引起共鸣。纵观古今中外,凡是历史上畅销的、能流传下来的作品,哪部不是切合时代的需求的?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哪部不是适应时代潮流产生的?再看看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易中天、钱文忠、于丹的作品,虽然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至少让很多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认知了历史与文化。

第三,历史学家笔下的作品是要从史料中发现故事,而非小说家、历史小说家笔下的故事。这就需要作者有很好的职业训练,不但对史料了如指掌,而且要善于从新的角度去编排、去解释、去阐发。当然历史学家在写作过程中也要发挥想象,但这种想象是以材料为基础,而非小说家的以生活为基础的形象。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编纂是诗化性质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就其基本特征而

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公众“悦”读方面如何叙事。

第四,相对来说,“悦”读作品讲究的是艺术性、启蒙性、可读性,而非学术著作侧重的学术性、知识性、思想性。历史学家讲究的是“句句有出处,字字有来历”,因此学术性与可读性之间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避免不了的,讲究可读性难免让学术含量下降,侧重学术性难免会失去趣味性。但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只要用心,不断探索,是能做到深入浅出的。大家写小书的时代真的逝去了吗?前辈著名学者如王力、朱光潜、竺可桢等,都撰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书,这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与需要。

第五,“悦”读作品选题不能墨守成规,要能反映学术界的研究方向、趋势与趣味。20世纪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新史学的发达。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研究历史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新文化史家不追求“大历史”(自上而下看历史)的抱负,而是注重“小历史”(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意义,即历史研究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劳特利奇出版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出版过不少好书。如前者出版的“牛津通识”系列,就是比较典型的大家小书,无论是选题还是作者的遴选都堪称一流;后者的选题意识尤为突出,出版了诸如《世界历史上的食物》、《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世界历史上的移民》、《世界历史上的消费》、《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等让人叫好的作品,诚如该丛书主编所说:“本丛书专注于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考察一系列人类历程和制度,其目的就是严肃认真(即便很简单)地讨论一些重要议题,以作为教科书和文献集的补充。相比教科书,这类书籍可使学生更深入地探索到人类历史的某一特殊

层面,并在此过程中使他们对历史学家的分析方式及其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有更全面的认识。每一议题都是按时间顺序被论述的,这就使关于变化和延续性的讨论成为可能。每个议题也都是在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和地区范围内被评估的,这也使相关的异同比较成为可能”。可见文明史因其能唤起大众的“悦”读兴趣而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市场。

不过当下公众“悦”读中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中国历史热,世界历史冷。从火爆的“百家讲坛”,到各类“戏说”历史的电视剧,无论是贺岁大片,还是各种图书排行,雄踞榜首的基本是中国历史题材作品。有关域外历史题材的很少,一方面说明我们对域外理解得不够多,另一方面说明我们潜意识里存在中国中心主义,什么都以中国为中心。

高手在民间,公众“悦”读作品也不例外。当下流行的畅销作品的作者基本属于所谓民间写手、草根写手,这些作者难免从“戏说”的角度出发,传播一些非历史的知识文化,值得我们警惕。学者应积极担当,做大家小书的事,这是必需,更是责任。

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女儿的十二条箴言,其中第六条就是“学习历史”。可见阅读历史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文化、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让民众明白: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尊严获得史。一书一世界,书中自有每位读者的世界。

本丛书为上海市地方本科院校“十二五”内涵建设文科师范一流学科项目,是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规划项目的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编者

2013年1月

致 谢

多年来，彼得·N. 斯特恩斯慷慨地给予我多次机会去书写关于世界历史上的革命及其影响的著作。这次尤其高兴能继续与斯特恩斯教授合作，参与其主编的“世界史专题”丛书的写作。

在这里，我要感谢劳特利奇出版社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将最初的写作大纲变成这本书。首先我要感谢的是非常耐心的高级编辑维多利亚·彼得斯（Victoria Peters），其次是制作编辑鲁思·惠廷顿（Ruth Whittington）和项目经理科林·摩根（Colin Morgan），他们给予我最大的帮助。

斯威特布莱尔学院（Sweet Briar College）在两个方面一直支持我。多年来，学院一直让我教授“现当代世界革命”课程。2003年，学院行政管理部门还友好地给我两周时间去越南和柬埔寨旅行，以探寻越南革命遗迹。

莫莉·卡尔克斯坦（Molly Kalkstein）是一位与我在其他项目中有过多次合作的优秀编辑，她对我的整部书稿进行了认真仔细和极有帮助的审读，她的评论和建议对我的书稿审定极有助益。

最后，我还要感谢南希·达顿·波特（Nancy Dutton Potter）博士的支持和帮助。她非常正确地坚持认为我应该重新思考和重写绪言（本书第一章），她提出的富有见地的建议有助于我完成这件事情。当然，南希·达顿·波特博士和上面提到的任何人都不应为或

许仍存在于书中的错误承担任何责任。

迈克尔·D. 理查兹

斯威特布莱尔学院，弗吉尼亚州

2003年12月8日

目 录

译丛序言 / 001

致 谢 / 005

第一章 将革命带回历史 / 001

第二章 17 世纪英国革命 / 011

第三章 墨西哥革命 / 025

第四章 俄国革命 / 042

第五章 越南革命 / 062

第六章 伊朗革命 / 082

第七章 世界历史上的革命 / 099

索 引 / 113

译后记 / 127

第一章

将革命带回历史

世界历史充满了政变、起义和反叛。相比之下，革命却相对少见。第一场革命大概是发生在16世纪晚期的荷兰反抗西班牙王室的起义。本书试图将革命带回历史，通过考察17世纪到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革命所发挥的作用来达到这一目的。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本书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将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与20世纪的墨西哥、俄国、越南和伊朗的革命进行比较。

对这五场革命的比较研究以三个论点为指引。第一个论点：从17世纪起，政治这一剧目中就已经包含了革命的现象。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在17世纪变成了一种玩弄政治的方式，一种决定谁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要付出什么样代价的方式。

第二个论点：运用权力比夺取权力更加重要。显然，夺取权力是运用权力的前提，也相当重要。但是，如果不研究革命的生命历程，就不能称其为充分理解了革命。如果说本书还有一些原创性，那就在于“革命远远超越夺取和稳固权力”这个观点。它们可能会有插曲或分段，就像俄国革命那样。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也就是“斯大林革命”，或许可以被视为1917年革命的第二次，也是更剧烈的部分。事实上，很难说一场革命在什么时候结束。它镶嵌在民族的历史中，不断地被用在，或者误用在当代政治中。

第三个论点：革命是否彻底完成过，因为判断一场革命是“成功”还

是“失败”的标准有多种。这样的命题自然是有争议的，因为它似乎建立在高度主观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不过，还是有一些应用于个体革命的标准，或许可以对它进行客观的评价。一场“成功”的革命，应该有以下标准：(1) 它应该谋求个人自由；(2) 它应该形成灵活而开放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能够应对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变革；(3) 它应该对受其影响的人们的福祉方面有所促进或改善。

2 革命现象只有在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以下进行的比较研究遵循的是中间路线，即介于大多数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方法，前者（历史学家）多用个体研究的方法，后者（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多用整体理论解释革命。

不久之前，我提出了“革命群”（clusters of revolution）的概念，如在18世纪末的“大西洋革命”（Atlantic Revolutions），1848年的欧洲革命，1900—1920年的几个所谓“半殖民地国家”（俄国、波斯、墨西哥、中国）的革命。考察这些“革命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广泛模式的好方法。与此同时，坚持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产生差别这一点仍然很重要，即便革命同时发生，并具有相似的环境因素。在叙述大量细节方面，模式或者类型学的考察是有用的。不过，最终从这些努力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必须以特定革命经验的历史细节为基础。

认识到革命这一概念有自己的历史也同样重要。关于革命概念的认识，21世纪初的人们肯定与20世纪初的人们的看法不一样。在20世纪里，俄国、中国、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已经改变了人们看待革命的方式。革命者自身往往会有一个历史的视角，以期从过去寻找可以利用的经验或者教训。

在这一点上给革命下定义可能就是无效的。在最小的层面上，革命包括武力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者要恢复一个已经被破坏的政治制度，或者引入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情况下，革命还包括创立不同的社会或经济秩序。在某些情况下，革命可能涉及彻底的文化变革。

厚重的理论太容易使人迷失，比如要找到一个关于革命的有用概念；但简短的理论上的定位还是有用的。对革命来说，1979年是一个“好年

头”。这一年,不但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出现了两场非常不同的革命,而且出版了一本由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撰写的开创性的著作,即《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国家与社会革命》出版后有关该书的评论清楚地表明,斯考切波的观点尽管在回应批评时有所修正,但时至今日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斯考切波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学生,而巴林顿·摩尔是比较革命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斯考切波的一个学生杰夫·古德温(Jeff Goodwin)又是一位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比较研究领域的领头人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谱系。]

我从斯考切波的著作中主要借鉴到的是其强调国家无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上都是一个自主的“演员”。要有发生革命的契机,国家就必须创造一个潜在的革命形势,当然并非是故意的。这可能包括财政危机,如1789年的法国,或者政权无法维持一个有效的贵族联合的局面,如1910年的墨西哥。

3

一些群体,或者可能是几个群体的联合体,就会对潜在的革命形势作出回应。未来的革命者可能早在形势发展起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也有可能只是在新的可能性出现后才找到彼此。其中,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著作《从动员到革命》(*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对于理解革命者如何组织革命并确定必要的资源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尽管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它们却更多地阻碍而非廓清了革命的动力。此外,也成为问题的是,它们强化了把注意力集中在革命起源的趋势方面。我读研究生时,阅读了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精彩研究成果,该书英文版的名字是《法国大革命的降临:1789年》(*The Coming of French Revolution: 1789*)。它非常令人信服地列出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贵族革命是其开端,资产阶级革命成立了国民会议并开始起草宪法,平民革命以及接下来的农民革命则保护并扩大了最初的成果。所有这一切在8月和10月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中汇聚为一体,导致了革命者和从凡尔赛回到巴黎的王室之间的斗争。勒费弗尔的分析虽然精彩又有说服力,不过最终还是太过于程式化,不能反

映革命开始的几个月里的复杂局面。

最后,还有文化问题。1981年,我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组织了有关“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的专题讨论会。其中的一位参与者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提交了一篇长文,后来刊登在《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上,该杂志同时还刊登了斯考切波的一篇反驳文章。我用不着在休厄尔和斯考切波那场富有成果的辩论中表明立场,只想指出它使我意识到文化是多么重要。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在墨西哥革命中的作用是一个展示文化力量的例子。1909年,他被选为阿内内奎尔科(Anenecuilco)村议会的主席。在他30岁的时候,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村庄权利的有力捍卫者。虽然萨帕塔并非一位农民,也没有在大农场当过一天的劳工,不过他仍然被视为人民中的一员。他认识到自己的村庄和莫雷洛斯(Morelos)州的许多其他相似村庄中面临的问题,从而使得他成为墨西哥革命的坚强领袖。然而,由于缺乏在更大层面上的纵观全国的视野,这意味着他将最终落伍于其他视野更加开阔的革命者。

出于将革命带回历史的需要,本书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而非18世纪的法国革命开始写起。前者以非常显著的方式揭示出革命只不过是另一种玩弄政治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卷入17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及1688

4

年的英国革命的人民只是不情愿地改变了既存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变化以复辟或保护古老权利和制度的形式伪装起来。

在法国,革命最初似乎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反应,但很快在实践中就开始企图脱离历史,重新开始。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玩弄政治的方式,或许将政治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如此,即便是在法国以及后来的意在重新开始的革命中,革命仍然是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无论革命是建立在现存的制度和程序上,还是试图重新开始,它都必须被视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有时,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历史中,面对特定的形势,除了通过革命外,诚如杰夫·古德温(Jeff Goodwin)一本关于革命的新书《别无出路》(*No Other Way Out*)书名所示那样,简直就是“别无出路”。在应对政治参与其中的任何形势时,都要付出代价。政治基本

上是一个决定谁为了达到预想的目的,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以及以何种方式付出代价的过程。

“冷战”引起了对革命起源研究的嗜好。其原因是,如果能够弄明白引发革命的原因的话,也就有可能设法阻止革命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从过分关注革命的起源与夺取权力转向了关注权力的运用。无论如何,本书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开始叙述,有助于我们理解用“长时段”眼光看待革命现象的重要性。

除非我们已经看明白了革命者如何运用权力,否则就很难去判定一场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当然,最终没有夺取政权的革命很显然是失败的,尽管它有可能留下一份遗产,就像俄国的1905年革命。一场革命的“失败”也有可能为其最终的“胜利”创造条件。例如在17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革命中,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查理二世的复辟似乎标志着17世纪中期革命努力的失败。然而,斯图亚特王朝问题缠身,而1688年的革命似乎又成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一个革命性的进程,伴随着偶尔的准革命性的形势,导致以下议院为政治中心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发展,而这是一个成功而又持久的政治制度。

革命的观念一旦成为政治剧目的一部分,即便是许多政治角色不在意承认这一点,个人和群体都频频地试图利用它。19世纪各种模仿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尝试不断地进行着,但大多数并不成功。其中的几次尝试就发生在法国,因为法国人似乎注定要重复他们最初的革命经历。最终,19世纪的革命表明了革命的历史特征(historical character)。19世纪的革命大多数是关于政治的,尽管也有社会问题乃至一些关于文化变革的观念掺杂其中。在19世纪的历程中,世界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改变,即便仅仅由于政治问题的缘故,政治的诉求也发生了变化。附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使得形势更加复杂化。对革命应该达到何种目标的期望急剧增加。

法国大革命之后,带着重新开始的想法,许多革命发生了。自相矛盾的是,它们试图通过摧毁旧制度,并代之以一些与旧制度、文化和传统无

关联的东西的方式,超脱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逃避历史。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Pol Pot regime)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渴望代之以一个乌托邦制度,而其中所有的革命者都是良善纯粹的。

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为本书设置了一个平台,由此可使人们关注一些既希望修正,又打算确立一些极为不同的东西的努力。英国革命还指出了关注运用权力的重要性,以及其中“失败”有可能最终导致“胜利”的方式的重要性。最后,英国革命还影响了其他国家以及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思想。

余下的四章聚焦于20世纪的革命:墨西哥、俄国、越南以及伊朗的革命。墨西哥革命是20世纪第一个大革命,它开始于1910年,并持续了近十年的时间。它还是展示本书主旨的绝佳范例。例如,作为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革命是另一种貌似合理的政治形式,是与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政权的失败,即未能维持一个有活力的政治制度连在一起的。或许把一个维持了34年的政权称为失败不太公允,但是它在1910年的垮台确实为革命开辟了道路。其次是关于权力的运用。要追溯这个主题,就要考察墨西哥的历史道路,不仅革命年代,而且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要考察。从革命的混乱中产生了一个非常稳定而又愤世嫉俗的政治制度,而且几乎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制度,因为它只对特定群体管用。但至少就其本身而言,它比20世纪20年代人们预期的更加成功。最终,墨西哥革命的“成功”或“失败”将取决于接下来几十年内它所确定的发展方向。

俄国革命必须被算作20世纪最重要的革命性巨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直接导致了二月革命,最终还引发了十月革命。弗拉基米尔·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其有助于创造使十月革命变为可能的条件。革命继续成为一种政治方法,但现在似乎是一种更具引导性的替代方法。

俄国革命,特别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的运作越来越像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变体,而具备成为大国的潜力,它确实也做到了。列宁似乎指明了夺取并维持权力的道